

安徽科技学院稳定人才项目（GJWD201601）成果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10）成果

全球价值链 与产业结构调整

李强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安徽科技学院稳定人才项目（CJWD201601）成果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10）成果

全球价值链 与产业结构调整

李强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结构调整/李强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096-5474-3

I. ①全… II. ①李…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②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中国
IV. ①F11 ②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281 号

组稿编辑: 王格格
责任编辑: 王格格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张晓燕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2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474-3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并且有人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实际 GDP 将赶上美国，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均 GDP 还不到美国的 1/10（按现价美元算），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小时平均工资不到美国的 1/15。按照库兹涅茨（1991）所说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力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相伴随的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个定义，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要在人均 GDP 上持续提高，赶上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更为显著的经济结构变化来支持。

众所周知，从 1978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制造业在 GDP 中比重长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国内表现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当国内制造业满足国内需求之后，增长引擎转向国外需求。不难发现，自中国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变成加入全球化专业化分工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吸收了大量来自国外制造业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的转移，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中间产品贸易大国。中国出口从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转变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贸易并重的贸易结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其基本决定因素是相对富裕的劳动力禀赋和绝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带来的巨大的“人口红利”。

从附加值和增加值来看，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都是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产品，来自国内地区间竞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竞争。在最终产品上，表现为产品定价能力有限，附加值较低。在中间产品上，虽然涉及了高技术产业，但是由于作为代工者，缺乏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在产品增加值中，中国获得的份额小，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发达国家来说

(以美国为例),出现了GDP总量之比上升幅度大,人均GDP之比上升幅度小(1988~2008年,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GDP与美国之比从12%上升到31%,上升了19%,人均GDP与美国之比从3%上升到7%,上升了4%)的情况。这意味着“只长骨头不长肉”“贫困式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特征:

(1)相对于OECD国家和东亚国家来说,中国形成了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产品贸易表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二是以产品内贸易表现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定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而且后者在中国净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自2000年后迅速增长,大大超越了前者。

(2)在需求结构中,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使得净出口以及支持净出口的投资所占比重偏高,消费占比偏低,呈现出投资偏向性需求结构。

(3)在全球价值链中,各国产业结构差异演变成价值链结构差异,其中发达国家在各种高技能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中主导高附加值环节,利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身相互竞争导致的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优势,让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以此保持和扩大发达国家自身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为本国消费者、生产者提供价格更低的产品,同时获取高附加值环节的高额利润。与此同时,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产业中,升级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需要在各国之间进行协调,产业升级难度和成本大大提高,面临着长期处于低端环节的危险。

(4)在国内三次产业结构中,制造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服务业发展主要满足于制造业发展的需求,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物流、金融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发展迅速,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

(5)在区域结构中,制造业投资尤其是来自国外的投资集中在接近国际市场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包括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

(6)在城乡结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率先集中于城市,来自国外的制造业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也优先选择城市,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优先得到满足和提升,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和社会保障严重滞后。

(7) 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由于产品竞争程度高、定价能力和附加值低，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以来难以大幅度提高，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对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低；相比而言，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增长保持稳定。

(8) 在劳动力技能结构中，长期以相对富裕与相对工资低的劳动力密集性投入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或者形成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足。1995~2006年，中国净出口产品中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净投入是负的，并呈现扩大的趋势（中等技能劳动净投入从-29412百万美元扩大到-86224百万美元，高技能劳动净投入从-7106百万美元扩大到-20957百万美元）。相比而言，低技能劳动净投入是正的，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从49465百万美元上升到259888百万美元）；资本净投入虽为正，但是显著低于低技能劳动净投入（从5943百万美元上升到67828百万美元）。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低附加值制造业投资和净出口，其中又主要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密集投入，呈现出低技能要素投入偏向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当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时，低技能要素（包括低技能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资本、技术等要素）成本开始上升，中国定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将失去成本优势，如果转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投入，这时将与发达国家展开正面竞争。这要求中国需要制定恰当的竞争战略，对上述一系列结构进行系统的、有序的战略调整，能提供足够的激励来吸引、培育和优化配置来自国内外的高技能劳动力发展，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关键是将经济增长依赖“人口红利”转变成依赖一系列结构调整形成的“结构红利”，进一步说，是将支持“人口红利”的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禀赋结构改变成支持“结构红利”的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禀赋结构。

综上所述，本书从中国加入的全球价值链及其演变趋势角度，审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竞争和战略性选择，提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本质上应从激励低技能要素配置与再配置的结构转型为激励高技能要素形成、配置与再配置的结构，实现高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指导性目标。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含义在全球化竞争和分工中多了一层，即中国经济结构定位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不可避免要遭遇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国家发生在高技能要素、品牌等方面的正面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相同升级的竞争，这种经济结构定位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选择。研究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升级，实际上是对全球价值链这个结构框架进行解剖，从各个价值链环节所需要的协调和政策支持来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可以说，这种对我国“十二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解读能够提供更为具体的思路和指导方向。

定位于价值链中高端，实际上是增强中国企业在众多产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过程知识密集化与信息化、营销网络和自主品牌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和控制。这些涉及各个产业中企业努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涉及政府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政策调整。本书立足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价值链中各种升级方式对需求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工和互补、区域间分工和城乡协调等结构调整的需要及其对各种结构变化的影响，选择相互协调配合的、调整成本最小的调整方式。这对各级政府相关经济职能部门在结构调整政策制定中各司其职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在理论上，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分析不仅采取通常的将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的产业或部门之间再配置的视角，而且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将各国产业结构视为各国各类产业中企业各种业务活动都涉及的价值链分布结构，将各国产业结构变迁理解为劳动力在价值链上不同附加值环节之间的再配置所导致的各国在产业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书研究与价值链分布结构变迁要求相适应的需求结构、制造业与服务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互补性及其对调整政策协调性的要求。这些研究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是不多见的，因此，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也存在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的国际经验	1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的新趋势	1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	3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全球产业发展的影响	10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发达国家的产业变迁与升级	13
五、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变迁与升级	20
第二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中国的道路	37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特征分析	37
二、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的特殊性分析	43
三、全球价值链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	53
四、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取向	68
五、战略性发展本土跨国企业，构建平行发展的 GVC 和 NVC 分工网络	72
第三章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	73
一、引言	73
二、理论模型与假设	75

三、实证分析	79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88
第四章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研究：中国的经验分析	91
一、文献综述	92
二、主要变量测度与理论假设	93
三、实证分析	99
四、结论与启示	105
第五章 我国产业升级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视角	107
一、引言	107
二、文献综述	109
三、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110
四、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实证分析	115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25
第六章 金融发展与我国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视角	129
一、引言	129
二、理论分析	131
三、实证分析	136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144
第七章 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对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理论假说与检验	147
一、引言	147
二、文献综述	148

三、模型构建与假说	150
四、假说检验	15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57
第八章 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引擎和杠杆	159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159
二、产业升级的引擎：产业化创新	162
三、转型升级的路径：资产重组	166
参考文献	175

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的国际经验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的新趋势

近 20 年世界范围内所呈现的生产的“碎片化”，即全球价值链扩散化，加深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使得贸易与技术、制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复杂化。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命题，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又有了许多新的特点，不再符合传统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些定义和预测。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人们发现，尽管价值链的各层级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更，但所有订单并不可能真如理论所言随心所欲地转移，因为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全球价值链所呈现的不断带动更多国家参与的扩散化特点，与部分区域优势日益成熟，并使得价值链末端日益重要的趋势，竟是并行不悖的。

以亚洲地区为例，1985 年这个区域的主要贸易参加者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日本作为主要的采购者，地位十分突出；1990 年“四小龙”的崛起，仍然是依靠日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但同时日本也是该地区的最大出口国；1995 年开始，美国成为这个区域价值链的发起者，通过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排布供应链，后来还有菲律宾加入；2000 年以后，中国通过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密切联系，进入日本与美国的供应链中，并成为最

大的供应商；2005年以后，亚洲供应网的中心完全移至中国，中国成为中间产品的核心生产地，面向美国与欧洲国家，同时又接受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中间产品，许多标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其实已经演变为“中国组装”（Assembled in China）。

简而言之，亚洲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显示，传统价值链分工预想中可以灵活转移和变动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较为固定和互相依赖的。20世纪末，经济学家哈德森在亚太价值链中观察到：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能力是研发与生产能力，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能力是设计与市场营销能力。但是现在，即使是中端的集成和组装能力，以及末端的专业化水平，似乎都对价值链的竞争力较之从前有更大的影响。

所以，一方面，价值链日益扩散，更多的国家参加到价值链分工中；另一方面，价值链又日益集中在某些已经成熟的区域，对这些区域形成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并以这些区域为核心呈现进一步扩散的趋势。因此，过去垂直和水平分工的平面价值链布局，实际上正在被多层次多核心的立体网状布局所替代。

这些年显现的新趋势是，出于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追求，采购商会更加重视供应商关系的稳定和效率，因为对很多产品来说转移是有成本和风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培养成熟供应商后无限转移下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高端产品的贸易或投资往往更加集中化。

2013年以来，博世、通用、西门子、铁姆肯等一批欧美企业都开始在成都投资建设高端制造工厂，生产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领域的先进产品，韩国三星公司则首次把其全球领先的液晶面板项目放到了苏州，生产最新的产品。正如《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所指出的，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中国仍排在第一位。大量的熟练工人和高技术人才，以及完备的产业基础正成为中国新的综合优势，因此吸引着更多的高端制造业。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价值链发起人都试图通过更分散的生产过程和严格的区分来实现对价值链的控制。但是这样的控制，仍然不可避免让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集中在特定区域，而这些国家的贸易增长呈现商品密集型特征，而不是资源密集型特征。这些特定区域将带动外围，并辐射外围。

仔细研究当前亚洲的价值链布局，很难简单地归结出其产品生产、组装和销售的基本模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包，再将最终产品进口回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不再那么清晰。在许多情况下，生产过程进一步“碎片化”，设计和服务也被外包出去，组装的环节多层次化并被分散在各个地方，最终销售地有可能就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市场。

在亚洲供应网的阡陌纵横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具有对外辐射和吸纳的地位。一方面，这些节点承接高端订单或投资，并二次分包出去，将下游产业进一步扩散至其他国家；另一方面，这些节点吸收来自整个区域的供应，组装成产品或提供服务，进行返销或本地销售。

简而言之，中国有成熟的加工制造业基础、熟练工人和充足的供应链经验，中国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国内投资，它在亚洲经济中正是处于一种核心节点型的特殊战略地位。以中国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包括以市场和服务见长的香港地区、拥有强大关系网络的新加坡、具备较高科技含量和制造能力的日本等，其所呈现的集体优势，都在促使其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次级核心。必须关注这些新的动态，及时做出正确的产业发展判断。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升级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发展新特征

产品价值链以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为起点，经过生产制造环节，延伸到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一般情况下，产品全球价值链被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节，各大环节又内含若干子环节。相应地，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就表现为三大环节及其子环节间强劲的跨国分离渗透。当前产业分工体系的价值链变革日益渗入各国的产业结构体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各国产业沟通的渠道和方式，也形成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和结构分化的全新格局。因此，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产业概念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同类企业的总体，其外延被广化扩展，产业本身已是一个连接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际”概念，或称为产业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演化升级概念较之经典研究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转换的经典路径，而且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潘悦，200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网络中，单个国家的产业只是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产业价值链的跨国分离与整合，把各国原先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先行解构，再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在全球产业结构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若抓住机遇嵌入全球产业分工网络，或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转移，则其产业结构成长可能超过常规发展路径，实现结构成长的跨越式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网络化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重构中的组织创新，这样一种产业组织新形态使各国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1. 全球价值链分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国别独立性和完整性，最终产品已经不足以完全显示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此时产业竞争力更多地内显在产业高增值价值链环节的控制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网络中，产业全球化的演进打破了单一国家产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除特定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本地化的产业外，单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某个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同时，这种产业分工的全球范围内离散和区域小尺度范围内集聚格局的演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相近属性的企业集聚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专业化于价值链特定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整个产业链和最终产品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而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专注于产品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并增加产业控制力则更能有效地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一国企业竞争优势以在全球范围内设置和协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能力为根本特征，而高壁垒厚度的专利、品牌、特定的管理能力等垄断性资源成就了其网络整合能力。因此，就一国而言，其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本国企业在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产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关键环节和一般

环节分别为相对应的国家所占据。价值链的垄断性战略环节，往往只有特定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及企业占据，处于决定价值链的治理、组织和控制的地位，因此能够获得最多的产业增加值；全球价值链中某些具有完全竞争特征的一般环节，往往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对象，由于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们对价值链的影响力微弱，因而也只能获得很小的价值增加量。

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际产业转移不仅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创造条件，而且价值链转移的不断高度化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机遇

产业结构演化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进程之间存在一条密切联系的路径。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化往往受到本国要素禀赋、供给与需求的限制，结构演化升级一般遵循从低到高依次渐进升级的特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全球产业结构重构和功能专业化进程加快，发展中国家因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产业链而获得产业结构升级的跨越式发展。随着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速转换，产业结构走向服务化、知识化和生态化，决定其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也呈现出高度化、片段化趋势，产业转移有了新的转变。一是转移产业由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衰退产业为主，向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元化转移趋势转变；二是转移方式明显改变，以产业价值链片段化的工序型转移方式为主，替代了早期的产业链整体转移为主的转移方式。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内涵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经过初始产业的充分发展而进入更高层次的下级产业，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引导和推动某些重点产业的超前发展并且保护扶持本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使它们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自由经济状态下达不到的发展速度和高度，甚至跨越产业升级链条的若干阶段提前实现产业高级化。

3.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国际投资与产业转移创造了资源和需求一体化整合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

国际投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实现载体，作为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

的有效媒介，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提供了相对短缺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渠道。同时，跨国公司进入以及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众多分包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发展，也对发展中国家其他本土企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外向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扩大资金规模、提高技术能力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快速建立和发展起一个支撑经济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体系。因而，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积累高级要素和参与全球产业循环体系，促进本国产业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演进，进而提升本国整体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结构演化

在国际分工早期，各国产业价值链主要显示为一国内部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成长模式，因此，产业结构演化的重心就是推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比重的提高。特别对于后进国家而言，产业结构转化以工业化进程为前提，表现为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为工业超过农业的结构；进入工业化阶段后，产业发展先是偏向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表现为纺织、服装、轻工等先行；伴随资本积累和禀赋结构改善，资本密集的钢铁、机械、石油化工获得了发展的空间；最后，随着技术能力的扩张，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材料工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等国家产业发展均经历了这样一个结构依次转换的成长过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结构演化升级通常是指高生产率产业价值链或高附加价值的价值链环节对低附加值价值链或环节替代的过程，它是对传统的产业间结构转换所宣示的下级产业对上级产业替代的一种发展。换句话说，它超越了传统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依次转向资本密集型业，再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单向演化路径，表现在集聚高附加值价值链或环节比重的结构形态。在这样的逻辑下，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就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一个命题，同样，它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关注的问题。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在同一产业价值链发展，只是彼此分工的环节不

同，这必然导致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参与主体间攀升与反攀升的较量，同一价值链环节的不同主体间效率与生存的竞争，以及不同价值链链条的市场生存的竞争。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下的产业升级衍生出双重内涵，一层含义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产品价值链上实现从低端价值链环节不断向高端价值创造环节攀升；另一层含义则是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习得的经验逐步建构本土企业主导的产业价值链，发展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并提高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后，后起国家的产业构成情况可以迅速发展变化，但难掩其产业结构的低级化本质。以中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电子信息产业引进了大量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外商直接投资，电子产业一跃成长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的电子工业迅速改变了我国产品的出口结构，表现为以电子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迅速提高。在2006年电子工业出口比重达到29%，超过OECD国家该比例的平均水平，Rodrik（2006）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得出中国出口结构与其人均收入高3倍的国家相同的结论。如果按传统的产业发展观点来衡量我国的工业结构，似乎可以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如果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实我国只是在全球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环节上得到了发展，产业收益率不高，甚至不及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把握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质尤为重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由于产品价值链分工的扩展和泛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升级就拓展为三个路径：一是总体上遵循传统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变的产业间的高级化路径。二是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价值链前端的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三是从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向价值链后端的服务与管理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依照上述范式推演产业间的升级，其实同样可以将其归纳到价值链环节的升级模式。在这样的视角下，在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它们都存在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的激励。例如，在IT产业，电脑组装是IT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是整个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在IT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中，显示卡、线路板等关键部件是技术